

数字化改革的时代价值与推进机理

陈畴镛¹

【摘要】：数字化改革具有政治自觉、勇立潮头的时代价值，是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浙江落实落地的使命担当，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打造全球数字变革高地的战略选择，是放大浙江改革开放先发优势全面构建共同富裕和现代化新体系的变革重塑，是在高质量发展中奋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和省域现代化先行根本动力。数字化改革具有与时俱进、塑造变革的特性：以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为根本保证，以坚持人民至上、满足人民期盼为价值取向，以坚持理论创新、聚焦制度重塑为主攻方向，以坚持中国道路、打造全球数字变革高地为关键标志，以坚持开拓创新、激发活力动力为鲜明特征，以坚持自我革命、重塑干部能力为战略支点。数字化改革的思维方法是系统集成、多跨协同：以整体性特点把握数字化改革的全方位、全局性、一盘棋，以关联性特点把握数字化改革的体系化规范化推进，以动态性特点把握数字化改革的持续深化、迭代升级，以层次性特点把握数字化改革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向互动。数字化改革的推进策略是平台为基、应用牵引：以公共数据平台构建为数字化改革的关键“底座”，以“大脑”建设支撑数字化改革的智能化智慧化，以应用场景牵引体现数字化改革的人民主体性，以小切口大场景凸显数字化改革的实践可行性，以构建多跨应用场景强化数字化改革的资源配置有效性。

【关键词】：数字化改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浙江 改革开放 公共数据平台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9092(2022)04-0018-009

一、引言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百年变局叠加全球疫情，对人类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带来诸多新命题新挑战；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需要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突出问题，应对国家和区域治理中的一系列新矛盾新风险。

对此，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都提出了相应的战略决策，浙江在数字浙江建设、“最多跑一次”改革和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基础上，作出了全面推进数字化改革的战略部署，把其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抓手和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省、推进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战略举措。

一年多来，浙江数字化改革从夯基垒台、立柱架梁、探索创新到全面推进、积厚成势，开辟了省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新局面。2022年4月19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以数字化改革助力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论述，为全方位纵深推进数字化改革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浙江在全国率先启动的数字化改革，以推进省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以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高效协同为突破，以数字赋能为手段，通过高效整合数据流，科学改造决策流、执行流、业务流，推动各领域工作

¹**作者简介：**陈畴镛，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授，浙江省信息化发展研究院院长，浙江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科技自立自强背景下数字产业创新生态系统韧性演进机理研究”（编号：7217405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总体安全观下加强经济安全风险预警、防控机制和能力建设研究”（编号：21BZZ016）

体系重构、业务流程再造、体制机制重塑。

分析梳理数字化改革的时代价值、本质特性和方法策略，对于丰富完善数字化改革的理论体系，从理论和实践上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国家与区域治理现代化、政府数字化转型、数字治理等领域，学术界开展了大量研究，推动了理论与实践的不断发展。在快速进入数字社会的时代背景下，推进数字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已经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题中之义¹。数字时代的到来推动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变革与重塑²。

数字化转型是一个过程，旨在通过信息、计算、沟通、连接技术的组合等方式促使事务及其处理方式发生实质性的改变³。数字治理强调新技术应用及其引起的组织和社会变革，与公共部门创新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⁴⁵。发达国家在数字政府建设上作出的探索，为我国推进数字治理提供了借鉴⁶⁷⁸。

政府数字化转型不仅促使数字技术嵌入政府科层制以推进治理结构再造、业务流程重塑和服务方式变革，还构建着新型政府-社会关系、政府-市场关系，以支撑数字社会建构及数字经济发展⁹，数字政府是“治理理念创新+数字技术创新+政务流程创新+体制机制创新”的系统性、协同式变革¹⁰。

技术-经济范式的理论框架为数字经济时代政府治理提供了“技术赋能—价值重塑—治理变革”的理论逻辑¹¹，在政府治理系统中，坚持开拓创新的重点与逻辑是：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不断推进政府治理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方式机制创新¹²。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和相关文献为研究数字化改革的理论体系与实践路径提供了学理依据。

二、数字化改革的时代价值：政治自觉、勇立潮头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作出了“八八战略”重大决策部署，不仅为浙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擘画了宏伟蓝图，而且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基础。2020年春天，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期间，赋予浙江“努力成为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的新目标新定位。

数字化改革是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奋力打造“重要窗口”的重大标志性举措，是把坚定不移做“两个确立”忠诚拥护者、“两个维护”示范引领者落实到浙江工作各方面各环节，是扛起守好“红色根脉”，全力放大新时代新征程浙江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新优势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

数字化改革是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浙江落实落地的使命担当。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高瞻远瞩地作出了建设“数字浙江”的战略部署，把建设“数字浙江”作为一项战略性任务、基础性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五次到浙江考察，都作出了浙江如何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信息化发展的重要指示，为数字浙江建设和数字化改革提供了科学指引。

浙江全面推进数字化改革，是沿着习近平总书记谋划的“数字浙江”建设部署一张蓝图绘到底，在“四张清单一张网”“最多跑一次”改革和政府数字化转型等重大改革基础上迭代升级的新阶段，是省委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和数字中国重要论述作出的全新部署，是在新时代赶考之路上践行“五大历史使命”¹³的引领性举措。数字化改革体现了时代特征与浙江精神的有机结合，是从整体上推动省域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发动机。

数字化改革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打造全球数字变革高地的战略选择。当今世界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调

整，全球治理体系与治理模式都面临着重大变革。工业社会发展中西方治理体系与治理模式在世界上发挥了引领性作用，进入信息社会、数字时代，数字治理在全球治理体系与治理模式中的作用日益增强，而美欧等发达经济体凭借其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发展的领先优势，正在加快建立数字经济尤其是数字贸易领域具有全球约束力的规则体系，抢占数字治理制高点。

数字化改革是在数字技术快速发展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日趋广泛深入的时代背景下，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的战略选择；是在省域层面通过构建数字治理体系和机制，对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进行全方位、系统性重塑，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探路的变革性实践；是打造全球数字变革高地，提高我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数字规则话语权，开辟数字文明时代价值创造新空间的开创性探索。

数字化改革是放大浙江改革开放先发优势全面构建共同富裕和现代化新体系的变革重塑。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浙江率先推进市场取向改革，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了体制机制的先发优势，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创新创业积极性，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跨越。

迈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征程，浙江被党中央赋予先行探索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光荣使命，只有坚持与时俱进，进一步迭代升级改革开放先发优势，推进体制机制从发展型迈向共富型的变革，才能在更高层次更高水平上释放生产力、解放生产力、激活生产力，才能在新征程上继续走在前列。

数字化改革就是对省域治理的体制机制、组织架构、方式流程、手段工具进行全方位、系统性重塑，在新形势下推动生产关系适应数字化时代发展规律和特点，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破解要素流动不畅、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等制约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制度政策障碍，为社会、市场、经济增添新动能、创造新价值¹⁴。

数字化改革是在高质量发展中奋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和省域现代化先行的根本动力。经过改革开放后几十年持续快速发展，我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社会治理还有弱项，人民群众需求变化从追求“衣食无忧”到“高品质生活”的深刻转变，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更高要求，而且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也日益增长。

浙江面临着高质量发展中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的新使命新任务，迫切需要通过改革这个根本动力来应对各种风险与挑战。数字化改革充分尊重客观实际和人民群众需求，运用系统思维进行科学谋划，把全面深化改革与共同富裕示范区重大改革任务融会贯通起来、一体推进。以共同富裕示范区改革为关键着力点，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激发企业 and 市场创新活力；全面深化社会领域改革，加快建立体现社会公平的收入和财富分配机制、公共服务优质共享机制、省域一体化发展机制。

三、数字化改革的主要特性：与时俱进、塑造变革¹⁵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从党的百年奋斗的辉煌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总结概括了具有根本性、长远性指导意义的十条历史经验，揭示了党和人民事业不断成功的根本保证。把党的历史经验作为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的重要思想武器，就能从历史经验中增强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的定力、魄力、能力。从党的历史经验出发分析数字化改革的主要特性，能够加深对数字化改革重大意义和核心要义的认识。

以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为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最可靠的政治保证。数字化改革是在进入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中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更加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的实际行动。

从顶层设计看，数字化改革贯穿到党的领导全过程，覆盖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各方面，用数字化改革驱动党建统领整体智治，聚焦抓大事、促改革、定政策、管队伍、创氛围，形成重大应用量化闭环的体系构架。从组织领导看，浙江各级建立了党委“一把手”亲自抓的责任落实机制，省、市、县(市、区)成立数字化改革领导小组，省委每两个月召开一次有省市县三级主要领导参加的全省数字化改革推进会，形成纵向贯通、横向协调、执行有力的高效“执行链”。

从实践成效看，浙江不折不扣落实中央各项决策部署，确保数字化改革沿着正确方向阔步前进，引领了全省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企民企、社会团体、基层组织等积极投入改革大潮。如“七张问题清单”应用，围绕问题发现、生成、整改、评估、预防全周期，是运用数字化改革思路、方法、手段赋能全流程精密智控、全要素综合分析、全方位党建统领的多跨场景应用，取得了良好的实践效果。

以坚持人民至上、满足人民期盼为价值取向。“坚持人民至上”这一宝贵经验鲜明阐释了党的立场感情、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鲜明本质特征，是我们走向未来、赢得未来的制胜法宝。数字化改革正是从这一价值取向出发，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数字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顺应民心、尊重民意、关注民情、致力民生。

数字化改革聚焦国家所需、群众所盼、未来所向，以重大需求、多跨场景、重大改革“三张清单”为抓手，落实重大任务重大战略、解决重大问题、提升治理能力和群众满意度，为新发展阶段坚持人民至上提供了新作为新担当新路径。

以数字赋能促进“扩中”“提低”，在高质量发展中强化就业优先导向，扩大数字经济创业就业机会，推动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和低收入群体持续较快增收。以数字化技术和思维打造多领域、多维度、多方面的应用场景，为探索人的全生命周期公共服务优质共享提供有效路径，形成人人共享的数字社会。

以坚持理论创新、聚焦制度重塑为主攻方向。浙江不仅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基础，而且也提供了理论创新的重要源泉支持。数字化改革是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和数字中国重要论述的理论创新，是深刻把握新时代改革系统集成、协同高效新特征的理论突破。

数字化改革的本质是改革，从体系架构看，理论体系和制度规范体系成为重大标志性成果的落脚点；从改革内涵看，关键在于实现数字赋能到制度重塑、技术理性向制度理性的新跨越；从改革重点看，战略路径重塑、体制机制重塑、发展动能重塑、组织体系重塑、干部能力重塑等五个维度体现了改革突破的着力点。

因此，数字化改革是以理论创新和制度重塑的重大成果，推动浙江全面提升制度建设整体水平、增强制度综合竞争力，以“浙江之窗”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越性。以坚持中国道路、打造全球数字变革高地为关键标志。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浙江从创造第一批个体工商户、第一批私营企业、第一家股份合作企业、第一批专业市场为标志的民营经济发源兴起，到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作出“八八战略”重大决策部署以来，实现了从经济大省向经济强省、从对内对外开放向深度融入全球、从总体小康向高水平全面小康的跃变，走出了一条具有浙江特色的富民强省之路。

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浙江数字化改革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以浙江高水平推进省域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生动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强大生命力。同时，浙江数字化改革以构建适应和引领数字时代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治理方式为导向，打造全球数字变革高地，激发数字经济活力，增强数字政府效能，优化数字社会环境，构建数字合作格局，筑牢数字安全屏障，让数字文明造福人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坚持开拓创新、激发活力动力为鲜明特征。越是伟大的事业，越充满艰难险阻，越需要艰苦奋斗，越需要开拓创新。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浙江发生历史性巨变的过程，就是坚持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过程。

浙江坚持市场取向，着眼于市场主体培育、市场机制创新、市场环境优化，形成了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相得益彰的先发性优势。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改革开放永无止境，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积极开拓前人未曾涉及的“盲区”、奋力突破矛盾错综复杂的“雷区”、勇于探索阻碍发展的“禁区”。

以数字化改革撬动各领域各方面改革，推进整体性、系统性重塑，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人才科创体制、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等重大改革取得新突破，体现了浙江人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的精神。在新阶段深化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据价值化、治理数字化、数字普惠化，进一步推动民营经济数字变革，激发民营经济“创富属性”，有效发挥民营经济在做大“蛋糕”、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中的主力军作用。

以坚持自我革命、重塑干部能力为战略支点。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数字化改革是牢固树立“没有走在前列也是一种风险”的紧迫感和忧患意识的责任担当，以大平台、大数据、大系统、大集成为导向，以整体智治、高效协同的理念对传统部门分散、割裂的机制与流程进行整合优化，让政府服务更有效率，让社会治理更加精准。

数字化改革是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难点痛点在于打破既有利益格局，削手中的权、去部门的利、割自己的肉。数字化改革是提升领导干部现代化能力的大舞台，数字素养与数字能力已成为新时代领导干部的必备关键本领，作为政府治理行为主体的领导干部，需要利用大数据进行分析研判以应对充满不确定性的风险挑战，需要培养数据决策与反应能力满足人民群众对政府治理的新期待。必须围绕构建党建统领的整体智治体系，不断创新战略思维方式，提升数字治理能力，增强斗争本领，使各级党员干部成为勇立潮头的“弄潮儿”，更好地面向现代化、引领现代化。

四、数字化改革的思维方法：系统集成、多跨协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改革的重要方法。”¹⁶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把“坚持系统观念”作为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坚持系统观念，是把对象的互相联系的各个方面及其结构和功能进行系统认识的一种思维方法，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谋划和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整体性、关联性、动态性、层次性是系统思维方法的重要特征。数字化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是运用系统观念和系统集成方法推动重大改革的生动实践，其推动实施必然伴随一场深刻的思维变革和路径、方法、手段创新。

以整体性特点把握数字化改革的全方位、全局性、一盘棋。整体性是系统工程最基本的特点，系统工程把所研究的对象看成一个整体系统，这个整体系统又是由若干要素与子系统有机结合而成的。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统筹推进技术融合、业务融合、数据融合，提升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管理和服务水平。

数字化改革是党的领导、政府治理、经济发展、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法治建设的整体性变革，通过“1612”体系架构反映总体布局 and 主要任务，以“三融五跨”为推进路径¹⁷，通过建立数字化改革重大应用“一本账”，实行清单式管理，从整体与部分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中去揭示系统的特征和规律，从整体最优化出发去实现系统各组成部分的有效运转。

“三融五跨”要求改变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数据传递、决策执行模式，推动数据全量化的融合、开放、共享和条块业务大跨度、大范围的协同整合。因此，数字化改革具有极强的引领性、整体性和系统集成性，是引领发展格局、治理模式和生活方式变革的关键变量，具有一子落而满盘活、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撬动效应和放大效应。

以关联性特点把握数字化改革的体系化规范化推进。关联性是指系统单元的相互作用及其同整体的联系，充分协调部分与

部分之间、部分与整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以提高整体系统的功能。数字化改革涉及纵向一体化，省市县乡各层级一体推进、步调一致、高效协同，实现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和自下而上的应用场景创新相结合；涉及横向一体化，各部门各领域一体推进、步调一致、高效协同，发挥整体的最大效应。数字化改革的基本思想方法是集成构建解决问题的多跨协同模式、实现解决方案的量化闭环，以“场景化”“一件事”为抓手，通过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管理和服务去分析、判断、决策。

而 V 字模型持续迭代(图 1)，以聚焦重大任务为核心，持续迭代原有业务协同模型，建立新的系统集成的业务协同模型，同步推进数据共享模型迭代升级，是运用系统集成思维的有效方法，充分体现了复杂系统的关联性特点。在数字化改革的推进中，通过落实责任“一本账”，由牵头部门统筹推进“入账”场景的谋划、协调、开发、上线、推广等工作，制订标准，实施项目全流程管理，尽量避免“抢跑道”、重复建设、无序竞争，凸显了体系化规范化推进的要求。

以动态性特点把握数字化改革的持续深化、迭代升级。动态性是指在系统形成和演进中，为应对内外环境的变化，整体会不断分化集成，促进生成新的个体以及新的更高级的整体。数字化改革具有显著的动态演进特性，其本身是“最多跑一次”改革和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全方位拓展和升级，坚持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导向，兼顾当前、着眼长远。

数字化改革的整体架构从“151”体系迭代升级为“1612”体系，其中的“6”从原有的党建统领整体智治、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法治五大系统增加数字文化为六大体系，更加全面地反映了增强“四个自信”、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要求；增加的第二个“1”即基层治理系统，有利于实现省市县和县以下基层的平台贯通、体系贯通、数据贯通，本身就体现了动态性特点。

在实践过程中，将牵一发动全身重大改革分成迭代升级一批、启动实施一批、谋划推进一批三类，分类推进，充分体现了系统思维的动态演化特征。V 字模型持续迭代方法，从构建最小系统起步，聚焦关键、放大细节、迭代升级，实现认识不断深化、体系不断完善、能力不断提升，则为运用系统集成、多跨协同理念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提供了动态演进的视角和途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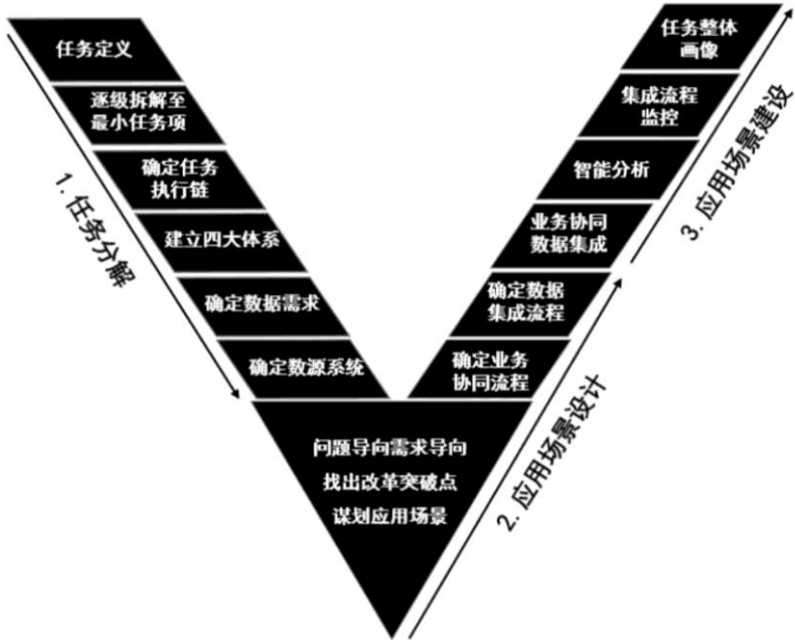


图 1 数字化改革的 V 字模型¹⁸

以层次性特点把握数字化改革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向互动。作为具有内部结构功能和外部环境功能的系统整体的存在，不是杂乱无章、无规可循的，而是按照一定的阶梯，有层次、有规律发展的。数字化改革系统内的单元层次之间有着不同分工，从宏观到微观、从定性到定量，从建立重大应用“一本账”设计跑道，到找准跑道加速跑起来，既要发挥省市县及县以下各级的贯通性，使不同层级的平台、应用、体制融会贯通、整体优化，又要发挥各层级各领域的自身特色，特别是发挥基层创新功能。

聚焦平台贯通，推动省市县三级平台迭代升级，强化数据治理，建立健全问题数据治理闭环管理机制，深化数据资源开放共享。聚焦应用贯通，打通顶层设计、基层创新的双向贯通路径，打通一地创新、全省共享的全域贯通路径。聚焦体制机制贯通，进一步健全一体化数据平台、六大应用系统及其与基层治理四平台的工作联通机制，将六大综合应用的功能进一步下沉，使六大系统的所有跑道都能在其中找到对应和落地。

五、数字化改革的推进策略：平台为基、应用牵引

“平台+应用”¹⁹，是基于数字技术的新经济系统的发展模式，在数据驱动、平台支持和网络协作的基础上开展各类应用创新。数字化改革的“平台(大脑)+应用”模式，是建立在数据集成共享、高效贯通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全省统一的公共数据平台，在此平台上迭代提升“大脑”的支撑作用，推进党建统领整体智治、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文化、数字法治六大系统和基层治理系统，从重大需求中谋划切入点，以重大任务牵引打造重大应用，是实现整体智治、高效协同的基本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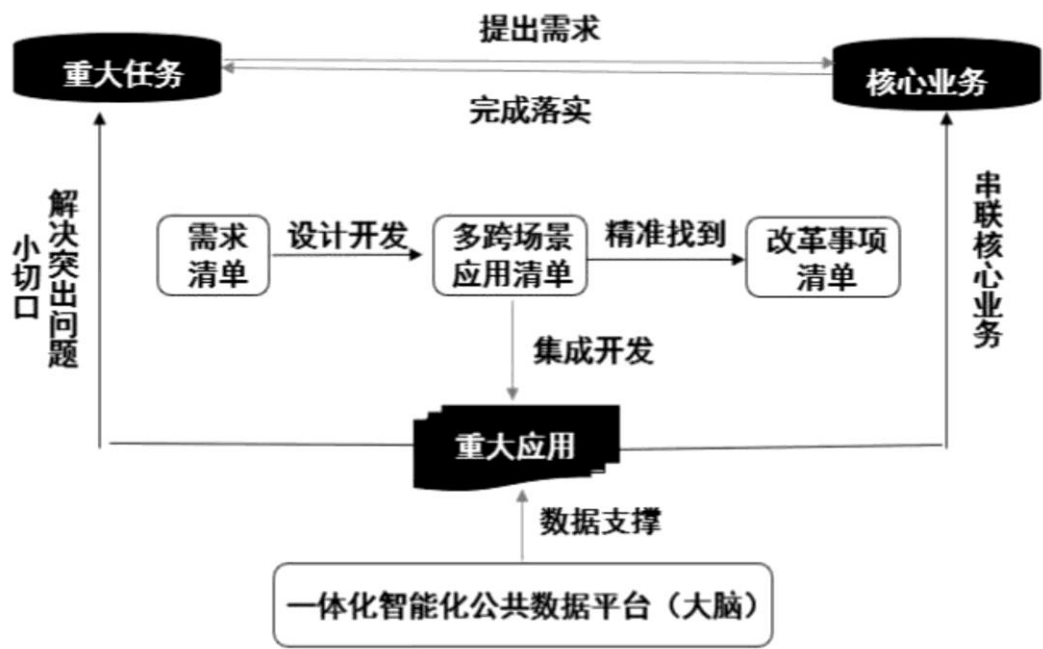


图2 数字化改革“平台+应用”关系图²⁰

以公共数据平台构建为数字化改革的关键“底座”。数字化改革关系到各种数据需求和解决方案，通过数字赋能，对每一项任务、每一个领域实现从宏观到微观、从定性到定量的精准把握，提升整体协同能力。数字赋能，必须以数据集成共享、开放应用、安全治理为支撑，实现数据和业务集成、数据为业务赋能。由一体化智能化数据平台提供分布式处理、应用框架、高可用等通用能力，大大降低了数字化应用的开发周期及开发难度，提升了数据资源配置的效率。

推进数字化改革以来,加快一体化数字资源系统建设(IRS),构建省市县一体化门户界面,全面建设市县两级公共数据平台,探索数字孪生机制,加强数据高质量供给,实现全省数字资源一本账管理、一站式浏览、一揽子申请、一体化生产、一平台调度、一张网管控,成为全国一体化平台建设的标杆。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并于2022年3月1日开始实施的《浙江省公共数据条例》,以及有关部门出台的《浙江省公共数据开放安全评估规范(试行)》等制度,为数据驱动治理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支撑。

以“大脑”建设支撑数字化改革的智能化智慧化。数字化改革中“大脑”的基本单元是数据,“大脑”是连接在一体化智能化数据平台上,为多跨应用提供智能化支撑的中枢系统。“大脑”是特定业务或领域公共数据平台的智能化能力中心,其核心是数据计算分析、知识集成应用、逻辑推理能力。“大脑”的作用,在于通过加工、分析各类数据,发挥数据的价值作用,以数字化促进智慧化,为治理决策提供科学化依据,促进管理的精细化,为领导干部掌握全面情况、选择战略目标、谋划改革举措、防范化解风险提供支撑。

在数字经济系统的产业大脑、数字社会系统的城市大脑构建和功能呈现的基础上,加快探索各领域“大脑”建设的路径,以算力换人力,以智能增效能。下一步将按照“系统大脑+城市大脑”的体系架构,“6+1”系统建设系统“大脑”,下设重点领域“大脑”;11个设区市建设城市“大脑”,推进城市生命体征全要素数字化归集,实现城市运行一网统管、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公共服务一网通享²¹。

以应用场景牵引体现数字化改革的人民主体性。数字化改革中的应用场景,与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需求相伴而生、相互作用,围绕需求构建的场景又会激发产生新的需求,如此良性循环不断地满足需求、迭代更新,成为数字化改革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主渠道、推进器。

谋划建设高权重高频次多跨协同场景应用,能够更为精准地抓取和分析人民群众的需求和期盼,在解决人民关切的痛难堵点问题的过程中实现纵向打通、横向联动,提供更为精准有效的需求满足。

以数字化改革三张清单特别是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应用场景切入,能更好地实现改革成效由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来评判,而不是从管理部门的工作方便出发来评判。围绕人民关切的问题构建“疫情防控精密智控”“七张问题清单”“公平在线”“外卖在线”“民生‘关键小事’智能速办”等应用,惠企利民取得实效,也得到了国家层面肯定推介。

以小切口大场景凸显数字化改革的实践可行性。通过“小切口大场景”,使复杂改革变成一个个简单具体可执行的任务,并开发成具体的场景应用,可以更好地发挥各地各方面积极性,大力推进特色改革,推动实现发展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相统一,围绕区域发展、创新能力、营商环境、社会治理水平、生态环境质量等方面,设定可量化细化具体化的数据指标,做到改革成果看得见、摸得着、够得到。

以小切口大场景牵引,有利于聚焦关键领域,从加快县乡一体、推动平台融合、加快数据共享、完善工作机制等方面发力,推动省市县乡村体系贯通、数据贯通;有利于从科学治理角度,以连通时间、空间、需求主体和治理主体,提高区域治理科学化、精准化和协同化水平,能减少由于改革探索可能缺乏实践打磨的治理模式所带来的风险;有利于各地各部门聚焦最现实、最紧迫问题,防止重数字化轻改革、重技术使用轻群众感受、重项目争取轻建设质量等弊端。

以构建多跨应用场景强化数字化改革的资源配置有效性。数字化改革涉及资金、物资、人员、数据、网络、技术等多方面要素资源,构建多跨应用场景,统筹应用开发,复用组件模块,能针对性地反映各维度各领域改革对要素资源的需求与配置状况,以政策制度创新提高资源配置的有效性,避免重复建设。

构建多跨应用场景,能促进数字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牵引政府数据在安全可控的基础上有序开放共享,引导企业数据、社会

数据加强流通,发挥数据资源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作用,放大数据价值化效应,对于扩大投资、引导消费、培育数字经济新生态也有着显著的带动作用。

构建多跨应用场景,通过发挥政府在规划引领、统筹协调、政策扶持、应用示范等方面的引导作用,完善要素资源自由流动、良性互促的市场规则,有利于引入市场化、社会化的运作机制,破除单一的政府投资模式,推动社会资本、人才等参与数字化改革。

六、结语

数字化改革的时代价值和理论意蕴,体现在守正与创新高度融合中。一方面,其政治自觉、勇立潮头的时代价值,以根本保证、价值取向、主攻方向、关键标志、鲜明特征、战略支点凸显的主要特性,与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总结概括的党的历史经验具有高度的契合性;系统集成、多跨协同的思维方法与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谋划和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一脉相承。

另一方面,其基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特别是数字化浪潮、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带来新命题新挑战,从省域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打造全球数字变革高地的新需求,探索在高质量发展中奋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的改革动力、路径与策略,充分体现了与时俱进、塑造变革的创新性。数字化改革既是根植于浙江特点的重大改革实践,也将形成“重要窗口”的重大理论成果,为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经验与样板。

注释:

1 鲍静、贾开:《数字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原则、框架与要素》,《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3期。

2 上官莉娜:《数字时代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进路》,《国家治理》,2022年第1期。

3 Vial G., “Understand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A Review and a Research Agenda”,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Information Systems,vol.28,no.2 (2019),pp.118-144.

4 Potnis D.D., “Measuring E-governance as an Innovation in the Public Sector”,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vol.27,no.1 (2010),pp.41-48.

5 Melitski J.,Carrizales T.J.,Manoharan A.and Holzer M., “Digital Governance Success Factors and Barriers to Success in Pragu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rganization Theory & Behavior,vol.14,no.4 (2011),pp.451-472.

6 张晓、鲍静:《数字政府即平台:英国政府数字化转型战略研究及其启示》,《中国行政管理》,2018年第3期。

7 陈畴镛:《韩国数字政府建设及其启示》,《信息化建设》,2018年第6期。

8 谭溪:《加拿大数字政府治理改革实践及反思》,《中国行政管理》,2021年第7期。

9 孟天广:《政府数字化转型的要素、机制与路径——兼论“技术赋能”与“技术赋权”的双向驱动》,《治理研究》,2021年第1期。

10 刘淑春:《数字政府战略意蕴、技术构架与路径设计——基于浙江改革的实践与探索》,《中国行政管理》,2018年第9期。

11 魏成龙、郭诚诚:《赋能与重塑:数字经济时代的政府治理变革》,《理论学刊》,2021年第5期。

12 孙彩红:《党领导下的政府治理创新:价值理念与逻辑进路》,《国家治理》,2022年第2期。

13 浙江省委十四届八次全体(扩大)会议明确的“五大历史使命”:一是书写忠实践行“八八战略”的新篇章,二是展示奋力打造“重要窗口”的新成果,三是展现探索构建新发展格局有效路径的新担当,四是开启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省的新征程,五是提升党员干部队伍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新能力。参见《浙江日报》,2020年11月20日第1版。

14 《浙江省数字化改革总体方案》,浙委改发[2021]2号。

15 本节部分内容发表在2022年2月14日《浙江日报》理论周刊上。

16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六次会议强调抓好各项改革协同发展改革整体效应朝着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聚焦发力》,《人民日报》,2017年6月27日第1版。

17 “1612”的第一个“1”即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平台+大脑)，“6”即党建统领整体智治、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文化、数字法治六大系统,第二个“1”即基层治理系统,“2”即理论体系和制度规范体系。

18 本图来源为浙江省数字社会系统建设工作指南(2.0版)。

19 “平台+应用”也是一种开放式研发体系,平台提供核心架构和基础组件服务,基于平台组件能力快速构建各类应用,支撑个性化创新。

20 作者根据相关资料修改。

21 袁家军:《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为指引全方位纵深推进数字化改革》,《学习时报》,2022年5月18日第1版。